

ZHONGGUO GUDAI SHEHUI JINGJI SHILUN

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

——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

陈锋
张建民◎主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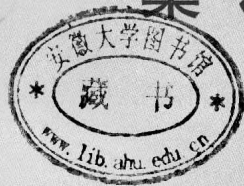
ZHONGGUO GUDAI SHEHUI JINGJI SHILUN

古代社会经济史论

——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

陈
锋

张建民◎主编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: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/陈锋,张建民主编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.6

ISBN 978 - 7 - 216 - 06432 - 3

- I. 中…
II. ①陈…②张…
III. ①经济史—中国—古代—文集
②社会发展史—中国—古代—文集
IV. ①F129.2 - 53②K220.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2368 号

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

——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

陈 锋 张建民 主编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字数:639 千字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34.75
插页:3

版次:2010 年 6 月第 1 版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6432 - 3

印次: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78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前 言

今年是吾师黄惠贤教授八十华诞，惠贤先生 1931 年 6 月生于湖南南县，195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执教达半个世纪。先生曾任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，独著和主编有《校补襄阳耆旧记》、《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》、《中国俸禄制度史》、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·魏晋南北朝卷》等书，为魏晋南北朝史、中国政治制度史、长江流域开发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先生为人真诚、豁达、平易、谦逊，学问精深、广博，对朋友推心置腹，对学生无微不至，吾辈弟子受先生教导尤多。在先生八十华诞、执教五十周年之际，作为弟子之礼，特为先生出版论文集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》，并出版纪念论文集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》。纪念论文集收录先生的友人、学生的论文及纪念文章共 41 篇，在收录过程中，前辈学者大力支持，同为先生学生的牟发松教授、夏日新研究员做了大量的工作，由我和张建民教授共同主编，最后由我统稿编辑。由于杂务繁多、时间紧迫，加之见闻不广，收录、编辑若有不周之处，尚望学界同人谅解。

陈 锋

2010 年 4 月 21 日

目录

前言/ 1

说“风流”

——其涵义的演化与汉唐历史的变迁/ 牟发松 1

从《三国志》到《三国演义》

——信史与史传文学的联系与差异/ 冯天瑜 24

从泰山到东海

——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侧面/ 刘安志 34

公孙述“成家”政权及其主客问题初探

——中国古代主客问题研究之一/ 梁贵川 58

论传统农业时代的自然保护思想/ 张建民 71

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人口税演进/ 陈锋 81

湖南里耶所出“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”/ 张荣强 96

论汉晋时期的“威惠”型官吏/ 柳春新 张东华 118

《太平经》断代/ 刘九生 133

独行考释/ 胡秋银 144

曹操用人与求贤三令/ 杨德炳 155

略论张昭与张纮/ 瞿安全 175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/ 熊铁基 195

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/ 夏日新 213

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勃兴/ 郑敬高 230

魏晋南北朝丧礼“依故事”探讨/ 高二旺 237

论六朝自然神祭祀与祈求巫术/ 吴成国 246



- 《吏民田家莛》的组合形式/ 蒋福亚 260
- 律令与晋令/ 张泽咸 275
- 陆机陆云思想趋向探微/ 周国林 295
- 习凿齿隐居江西说质疑/ 叶 植 307
- 十六国官制研究/ 周伟洲 320
- S. 6251 号北凉玄始九年随葬衣物疏补论/ 王 素 349
- 论晋宋之际“仕贵遗务”之风的变化/ 李 磊 354
- 襄阳雍州武力与刘宋孝武帝皇权政治/ 陈金凤 369
- 北魏龙城诸后问题考实/ 李 凭 379
- 李显甫开李鱼川之时间考/ 卢开万 397
- 长乐冯氏与元魏宗室婚姻关系考
- 以墓志为中心/ 鲁才全 403
- 北朝鲜卑婚姻制度的变迁考述/ 谢宝富 419
- 东魏北齐革命与《魏书》的编纂/ 佐川英治 刘 啸译 426
- 吐鲁番所出来自长安、洛阳的唐代文书/ 陈国灿 449
- 三洞四辅判教体系与唐朝道教统一体/ 钟国发 465
- 辋川怀古：唐代关中环境管窥/ 孙达人 475
- 复出《涿州范阳县文宣王庙之碑》跋/ 孙继民 488
- 唐代“士大夫”的特色及其变化
- 以两《唐书》用词为中心/ 黄正建 496
- 般若禅心 化生妙境
- 晓元法师禅诗“妙境”说试析/ 张 弓 503
- 张易事迹考/ 白 钢 513
- 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/ 卢开万 535
- 难得的良师益友/ 晋宏中 539
- 西行诗/ 彭神保 546
- 黄惠贤教授论著要目/ 石墨林 547

说“风流”

——其涵义的演化与汉唐历史变迁

牟发松

根据现存资料,“风”、“流”二字合成一词,始见于汉代。汉代以降,“风流”词义历经演化,发生了显著的变迁,及至唐朝,学者整理两汉六朝文献,已感到有必要对“风流”一词出注说明,且注家的理解也不尽一致^①,显示出唐代风流的涵义因备历嬗变而趋于丰富、复杂。前人对魏晋名士风流已有诸多研究^②,本文的关

① 《汉书》卷一〇〇下《叙传》“风流民化”句唐颜师古注(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,第4241—4242页),《后汉书》卷五三《周黄徐姜申屠列传》“前序”中“列其风流”句唐章怀太子注(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741页),都分别对“风流”作了注解。《文选》卷四七所收袁宏《三国名臣序赞》“远明风流”、“标榜风流”句,唐李善、刘良、吕向、李周翰诸人,都对“风流”一词作了注解,但理解却不尽相同。依次见《六臣注文选》(中华书局,影印涵芬楼宋刊本,1987年)第876,880,900,904页。并请参照下文相关论述。

② 有关魏晋风流最早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,当推鲁迅先生1927年发表的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(后收入《而已集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3年,第80—98页),宗白华先生1940年发表的《论〈世说新语〉和晋人的美》(收入《美学散步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年,第177—194页),冯友兰先生1943年发表的《论风流》(收入氏著《三松堂全集》第五卷,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309—317页)。三位先生就魏晋风流的主要表现、产生背景及本质特征等作了开创性的论述,其中鲁迅所论汉末魏晋之际“文学的自觉”及竹林名士风流的社会政治背景,宗氏所论晋人的精神解放、人格自由、艺术及审美特征,冯氏将魏晋风流概括为有玄心、有洞见、有妙赏、有深情四端,均对后来的研究影响甚巨。近年来有关魏晋风流的论著极多,大抵未能越出以上三位学者所论范围。又袁行霈氏《陶渊明与魏晋风流》(收入氏著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·袁行霈卷》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1999年,特请参见第338—339页),王能宪氏《世说新语研究》第三章“《世说新语》与魏晋风流”(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2年,特请参见第113—114页),均对“风流”一词在魏晋以前的涵义演变有所述及,虽极简略,但对本文不无启发。至于本文对其他相关成果的参照利用,当随文注出,兹不复赘。



注重点,则在于汉唐间“风流”语义的演化,语义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语境转换,以及风流涵义演化和演化由以发生的汉唐历史变迁二者间的关联。

一、教化与风流

西汉元光元年(前134),武帝下诏举贤良,所亲拟问策中有云:

伊欲风流而令行,刑轻而奸改,百姓和乐,政事宣昭……德泽洋溢,施乎方外,延及群生,子大夫明先圣之业,习俗化之变……其明以谕朕。

这大概是传世文献中“风流”一词的最早出现。^①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“晚世风流俗败,嗜欲多,礼义废”云云^②,也是西汉前期“风流”的用例。以上二例,以及东汉班固《汉书·叙传》“先王观象,爰制礼乐。厥后崩坏,郑卫荒淫,风流民化,泯泯纷纷”句中的“风流”,分别与“令行”、“俗败”、“民化”相对,属于主谓结构,表明这几例“风流”都还不是稳定、独立的双音词。不过至迟在东汉,就出现了作为独立名词的“风流”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:

及孝文即位,躬修玄默……而将相皆旧功臣,少文多质……论议务在宽厚,耻言人之过失。化行天下,告许之俗易。……风流笃厚,禁罔疏阔……有刑错之风。

同书《赵充国辛庆忌传》卷末“赞”:

秦汉已来……山西出将。秦将军白起……不可胜数。何则?……(山西)迫近羌胡,民俗修习战备,高上勇力鞍马骑射。……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,今之歌谣慷慨,风流犹存耳。

① 《汉书》卷五六《董仲舒传》,第2496—2498页;卷六《武帝纪》元光元年五月条,第160—161页。参荀悦《汉纪》卷一一孝武皇帝纪二元光元年条,中华书局张烈点校本,2002年,第173页。《资治通鉴》系此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十月条(中华书局,1956年,第549页),盖误,详考不赘。

② 何宁《淮南子集释》卷八,第602页,中华书局,1998年。贾谊撰、阎振益等校注《新书校注》卷三《俗激》:“天下之大指,举之而激。俗流失,世坏败矣。”校注引王念孙说:“失,与佚同。《(汉书)礼乐志》作‘风俗流溢’。”中华书局,2000年,第91,93页。据之,《淮南子》所谓“风流俗败”,即指风俗淫荡败坏。



东汉和帝、安帝间人苏顺《和帝诔》：

恭惟大行，配天建德。陶元二化，风流万国。……无为而治，冠斯往代。……洪泽滂流，茂化沾溥。

《后汉书·王畅传》载有恒帝时期南阳功曹张敞上谏太守王畅的“奏记”，如果我们认为范曄摘录的就是张敞的原奏文，则其中亦有一例：

五教在宽，著之经典。……卓茂、文翁、召父之徒，皆疾恶严刻，务崇温厚。仁贤之政，流闻后世。……（南阳）郡为旧都侯甸之国，园庙出于章陵，三后生自新野，士女沾教化，黔首仰风流。……愚以为……化人在德，不在用刑。^①

上举四例“风流”均已双音化，作为一个独立词汇，分别与“禁罔（网）”、“歌谣”、“陶元”、“教化”相对。以上诸例的出现时间表明，风流的双音化完成于东汉时代，而揆诸后世文献，可知“风流”一词虽在涵义上以后还有诸多变化，但在构词形式上却从此稳定下来。

上列诸例“风流”，无论是在双音化过程中的西汉，还是在双音化已然完成的东汉，其意蕴都是明确的，指向也是一致的，那就是“社会风尚（风俗、风气）的流播”，这显然来自于该词汇的两个组成部分：风和流。气之动为风，水之行为流^②，但上述诸例乃至后世文献中的“风流”，所指称的几乎都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人类社会现象。就上列“风流”的基本含义而言，即指通过教化形塑和推广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，所谓“风流而令行”，“风流民化”，“风流万国”，均为此意，“士女沾教化、黔首仰风流”，更是直接将“教化”对等于“风流”。这里的“风流”和“教化”都是自上而下的，即颜师古所谓“上风即流，下人则化”^③，“黔首仰风流”的“仰”即为生动写照。

① 以上依次见《汉书》卷二三，第1097页；卷六九，第2998—2999页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一二《帝王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新2版，第240页。《后汉书》卷五六，第1823—1824页。

② 许慎撰、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注》“风，八风也。东方曰明庶风……东北曰融风”，“流，水行也”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第二版，第677，567页。

③ 《汉书》卷一〇〇下《叙传》“述礼乐志”条颜注，第4241—4242页。



上引可知,所谓“教化”,就是用儒家理论(“先圣之业”、“五教”、“礼乐”)来教育和感化民众,其特征是“务在宽厚”,是“仁贤之政”、以德“化人”,是“玄默”、“无为”;教化的反面是刑罚,故“耻言人之过失”,“疾恶严刻”,“不在用刑”;教化的目标则是“民化”、“百姓和乐”,是“德泽洋溢”、“洪泽滂流,茂化沾溥”,也就是“化行天下”。那么,何以要用风流来表达教化的推行呢?

《尚书·说命下》:“四海之内,咸仰朕德,时乃风。”孔安国传:“风,教也。”《尚书·君陈》:“尔惟风,下民惟草。”孔安国传:“民从上教而变,犹草应风而偃。”《论语·颜渊》: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必偃。”^①上引均以“风”比拟“教”即“上教”、“君德”,而以“草应风而偃”比拟“民从上教而变”、“民之化于上”。又《诗大序》:“风,风也,教也。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。”据陆德明“音义”,“风,风也”的前一个“风”是十五国风,为“诸侯政教”;后一个“风”“即是风伯鼓动之风”,以比拟“君上风教”,因“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,如风之偃草也”。孔颖达疏亦谓“风”是“政教之名”、“施政之名”。^②总之,儒家经典以“风”为“君上之教”,以“风以动之”比拟君上所主导的“教以化之”,而“风动”即是“风流”,因此以“风流”来指称“人君”的“风动教化”,是非常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的。

儒家以“君上之教”来“化行天下”的另一个表述是“移风易俗”。如果“风,风也,教也”的“风”来自于“君上”,民众或为其“披靡”或“仰”而从之,“移风易俗”的“风”、“俗”则原本存在于民间,且因地而异,即《诗大序》所谓“国异政,家殊俗”,也唯其如此,所以才需要“美教化,移风俗”。应劭《风俗通义·序》:“风者,天气有寒暖,地形有险易,水泉有美恶,草木有刚柔也。俗者,含血之类,像之而生,故言语歌讴异声,鼓舞动作殊形,或直或邪,或善或淫也。圣人作而均齐之,咸归于正,圣人废则还其本俗。”^③应劭所谓“风”,是指自然环境方面的地方差异,如气候、地形、水文、植被;“俗”则指各地人民基于不同自然环境而出现的文化、性情及社会风气方面的差异。就特定地域内历代相沿、积久而成的特定风尚习惯而言,应劭所谓“风”、“俗”有相通之处,因而风、俗又合成一双音词,如上引《诗大序》中的“美教化,移风俗”。前文所引《汉书·赵充国辛庆忌传·赞》“今之歌谣慷慨,风流犹存”的“风流”,即相当于《荀子》、《诗大序》和《风俗通义》中的“风

① 《尚书正义》卷一〇《说命下》,同书卷一八《君陈》;《论语注疏》卷一二《颜渊》。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76,237,2504页。

② 《毛诗正义》卷一《周南·关雎·序》。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69—271页。“风”又有讽谏之意,即《诗大序》所谓“下以风刺上”,孔颖达注所谓“臣下作诗所以谏君”。但就汉代出现的“风流”一词,“风”主要还是指“君上之教”即“教化”。

③ 应劭撰、吴树平校释《风俗通义校释》,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1980年,第1—2页。



俗”。由于风俗都是长久流传、极具定势的，所以相当于“风俗”的“风流”又有遗风旧习、流风余韵之意，上举《汉书·赞》中“风流犹存”，实兼含此意。南齐乐蔼在给竟陵王萧子良的上书中称“道德以可久传声，风流以浸远挥称”^①，也就是“风流”的延承性和长久性而言。当然，这种“风流”通常是指称正面的良善的事物，有类于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“纣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遗俗，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”^②句中的“流风”。

尽管“风流”通常是指正面的、良善的风俗，但“风俗”本身却有善有恶。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下：“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。好恶取舍，动静亡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孔子曰：‘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’言圣王在上，统理人伦，必移其本，而易其末，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，然后王教成也。”班固这里所谓“风”，实兼包了上引《风俗通义》所谓“风”和“俗”。对这种各地有别、良莠不齐的风俗，应认为要“均齐”，班固认为要“混同”，也就是儒家所谓“移风易俗”。其实不独儒家，法家也是主张移风易俗的。使秦国迅速走向强兵富国之路的商鞅改革，首先针对的就是戎狄之俗，行之十年，风俗丕变，即李斯所谓“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”。^③但儒家二家移易风俗的手段和方法则完全不同。相对于法家的严刑峻法，儒家所标榜的是教化，认为政治不仅仅是治理百姓，更重要的是教化百姓；统治者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元首，更是道德教化的人师和楷模。^④“政者正也，君为正，则百姓从政矣。”统治者只须以身作则，被统治者自会如草随风，上行下效，从而达到“无为而治”。^⑤这样一种理想政治统治方式的精炼概括，就是以“风流”为特征的“教化”，它有如风动草靡，春风化雨，不须甚至是反对刑杀。汉初贾谊之竭力倡导教化、呼吁移风易俗——“商君遗礼义，弃仁恩……秦俗日败。……道之以德教者，德教洽而民气乐；殴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极而民风哀”；汉初文帝“专务以德化民”，“玄默躬行以移风俗”，“景帝遵业”，成就了“风流笃厚”的文景之治；^⑥均是对秦政的反动。两汉循吏之所施为，则是对“风流”、

① 《南齐书》卷二二《豫章文献王（萧嶷）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2年，第418页。

② 《孟子注疏》卷三上《公孙丑章句上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2684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八七《李斯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542页。

④ 《尚书正义·秦誓》：“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”孔传曰：“言天佑助下民，为立君以政之，为立师以教之。”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80页。

⑤ 《礼记正义》卷五〇《哀公问》，《论语注疏》卷一五“卫灵公”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11、2517页。

⑥ 《汉书》卷四八《贾谊传》，第2244、2253、2265页。同书卷四《文帝纪》，第135页，卷五《景帝纪》，第153页。



“教化”的实践。^①“风流”一词形成于两汉时代,并被赋予“教化”、“移风易俗”之义,实为新的时代和新的政治理念的产物。

二、东汉三国之际的名士与风流

“是真名士自风流”,这是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九回史湘云的话。^②而“名士”和“风流”联系在一起,则是在魏晋时期,但魏晋时期无论“风流”还是“名士”,其涵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较之两汉有明显不同。这一变化实可上溯至东汉时期。《礼记·月令》“季春之月”:“勉诸侯聘名士,礼贤者。”郑玄注:“名士,不仕者。”孔颖达疏引“蔡氏云”:“名士者,谓其德行贞绝(纯),道术通明,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。”^③则名士为有德才之名的隐居未仕者。《管锥编·史记会注考证》第9则曾广引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诸书之例,谓“《史》、《汉》之‘名士’则谓有名而犹未仕者”^④,尚为郑注、孔疏所理解的《礼记·月令》中“名士”之原意。就传世的两汉文献而言,几乎都可以证明钱先生的判断不误。不过在东汉前期班彪、班固父子相继编纂而成的《汉书》中,却有一条异例。其书卷九九上《王莽传上》:

(王)凤且死,以托太后及帝,拜(莽)为黄门郎,迁射声校尉。久之,叔父成都侯商上书,愿分户邑以封莽,及长乐少府戴崇、侍中金涉、胡骑校尉箕闾、上谷都尉阳并、中郎陈汤,皆当世名士,咸为莽言,上由是贤莽。永始元年,封莽为新都侯,国南阳新野之都乡,千五百户。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,宿卫谨敕,爵位益尊,节操愈谦。散舆马衣裘,振施宾客,家无所余。收贍名士,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。故在位更推荐之,游者为之谈说,虚誉隆洽,倾其诸父矣。^⑤

① 详见拙撰《从“移风易俗”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》,《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》第15号,2006年11月,第1—14页。

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4年第3版,第615页。

③ 《礼记正义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363页。“德行贞绝”,阮校据惠栋校宋本等,谓“绝”当作“纯”。

④ 钱钟书《管锥编》第1册《史记会注考证》第9则“律书·名士——兵与刑”条。中华书局,1986年第2版,第283—285页。本文关于名士为不仕者,即受启发于《管锥编》此条。唯钱氏所引《礼记·月令》“季春之月”偶误为“仲春之月”;又所引“勉诸侯,聘名士”,据孔颖达疏,“勉诸侯”和“聘名士”之间似不应断句。

⑤ 《汉书》卷九九上,第4039—4040页。



上引有两例“名士”。后一例(“收瞻名士”)亦为上揭《管锥编》所引,作为名士为未仕者之例。按“交结将相卿大夫”与“在位更推荐之”相应,“振施宾客”、“收瞻名士”当与“游者为之谈说”相应,则名士应如钱先生所说指未仕者。但前一例“当世名士”所指,则皆为人仕为官者。上揭《管锥编》同条又称:“至魏晋则凡得名早于得官者,虽已仕宦贵达,亦仍称‘名士’,且浸假推及于诸余著名之闻人,原意遂掩。”钱先生所言极是,唯仕宦中得名早者亦称名士,并不迟至魏晋,从上引《汉书·王莽传》可见,东汉前期已然。传中所列“当世名士”,均为西汉元帝以降的风云人物,即“著名之闻人”。^① 总之,他们任官时乃至入仕前均为当世“著名之闻人”。又东汉前期卫宏所著记载西汉官制的《汉旧仪》有云:“武帝元狩六年,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:史二十人,秩四百石……皆从同秩补。……官事至重,古法虽圣犹试,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,以博选异德名士,称才量能,不宜者还故官。第一科曰德行高妙,志节清白。……四科曰刚毅多略,遭事不惑,明足以照奸,勇足以决断,才任三辅剧令。”^②从“皆从同秩补”、“不宜者还故官”,可知当时“四科”所“博选”的“异德名士”,均为在职官员,实即“从同品秩官员中选拔丞相府属官的标准”,其来源则为“九卿及大行令的属吏”。^③ 记录东汉一代历史的编年体著作《后汉纪》、纪传体正史《后汉书》,分别为东晋袁宏和南朝刘宋范曄所著(今本《后汉书》所附诸志则为西晋司马彪《续汉志》),作为公元4—5世纪的文献,其中的语料未必完全保持了东汉时期的原貌,但它们都是以东汉时成书的《东观汉记》为主并博采多家《后汉书》编纂而成,其中还收录了不少东汉人的奏疏、文章,可视为当时语料,至少可以作为参照。《后汉纪》出现的“名士”有12例,有10例明确指出仕任官者。《后汉书》有21例,可以确定尚未出仕或不含出仕者的也只有2例。^④ 《后汉纪》卷八光武帝纪中元二年四月条,称受光武帝遗诏作为明帝辅政大臣的骠骑将军、东平王苍,“以母弟辅政,尽心王室,其所宾礼,皆当世名士”。《东观汉记》亦称:“东平宪王苍上书表荐名士左冯翊桓虞等,虚己

① 分别见《汉书》卷八一《张禹传》,第3349页;卷六八《金日磾传》,第2964页;卷七〇《陈汤传》,第3007—3029页。

② 卫宏撰、孙星衍等辑、周天游点校《汉官六种·汉旧仪卷上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68—69页。

③ 方北辰:《两汉的“四行与四科”考》,《文史》第23辑,第304—305页,1984年。参阅步克:《察举制度变迁史稿》,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7年第2版,第15—18页。

④ 分别见《后汉纪》卷四、卷八、卷九、卷二〇、卷二二、卷二三、卷二五至二七、卷三〇。中华书局,2002年张烈点校本。《后汉书》卷二五、卷三一、卷三九、卷四四、卷五二至卷五四、卷五六、卷六二、卷六五、卷六七、卷六九、卷七〇、卷七三、卷八二上、卷八四。



礼下，与参政事。”^①苍所宾礼、荐举的“当世名士”中，虽也有“隐居山泽，不求于世”者，如太原郇恁，但大多为在官之人。^②正因为东汉所谓“名士”率皆入仕之人，所以《后汉书·鲁恭传》称其弟丕任赵国相、东郡太守时，“数荐达幽隐名士”，^③特在“名士”之前冠上“幽隐”二字，即强调是未仕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见于《后汉纪》、《后汉书》中的名士，很多是指东汉后期与宦官相对立的党人即所谓清流。如号称“天下名士”的郭泰，延熹五年为黄琼会葬的“天下名士”、“四方名士”，何进、董卓先后执政时所辟选之“海内名士”、“天下名士”。^④特别是《后汉书·党锢传》称延熹九年(166)第一次党锢之祸后，“海内希风之流，遂共相标榜，指天下名士，为之称号”，即所谓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及”、“八厨”。建宁元年(168)，“三君”中的陈蕃、窦武“共秉朝政，连谋诛诸宦官，故引用天下名士，乃以膺为长乐少府”。上述《党锢传》中所谓“名士”，实即“党人”的代名辞；所谓“海内希风之流”之“风”，则是党锢名士的所谓“婞直之风”。《党锢传·序》称：

逮桓灵之间，主荒政缪，国命委于阹寺，士子羞与为伍，故匹夫抗愤，处士横议，遂乃激扬名声，互相题拂，品核公卿，裁量执政，婞直之风，于斯行矣。

范书《党锢传序》实本于袁宏《后汉纪》卷二二关于党锢之祸的议论，后者认为两汉士风变化，乃是由“任侠之风”而“守文之风”而“肆直之风”，并认为：“因其所弘则谓之风，节其所托则谓之流。……是以古先哲王必节顺群风而导物为流之

① 《后汉纪》卷八，第157页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七四《人事部·礼贤》引《东观汉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2175页。据《东观汉记》“上书表荐名士”之语，可知《后汉纪》“当世名士”语，或即照录东汉文献。不过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辑本《东观汉记》此条“上书表荐名士”作“上书表荐贤士”。参周天游《东观汉记校注》卷七《传二·东平宪王苍传》，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239页。

② 如班固推荐给东平王苍并被接受的六人，以及东平王苍所辟举的齐郡功曹吴良、南阳郡吏朱晖等，均已入仕，即未入仕者如郇恁，亦应苍辟召入府。见《后汉书》卷四〇上《班彪传附子固》，第1330—1333页。卷二七《吴良传》，第942—943页。卷四三《朱晖传》，第1457—1458页。

③ 《后汉书》卷二五，第884页。

④ 《后汉纪》卷二三《灵帝纪》建宁二年条，第452页。同书卷二二《桓帝纪》延熹四年条，第419页；《后汉书》卷五三《徐稚传》，第1747页。《后汉纪》卷二五《灵帝纪》中平五年条，第489页；同书卷二六《献帝纪》初平元年条，第504页。



途……中古陵迟，斯道替矣。……背异倾同，世俗之心也。……故欲进之士，斐然向风，相与矫性违真，以徇一时之好。”袁宏还对党锢名士“肆直之风”的“益”、“弊”分别作了评述，^①这里姑置勿论，与本文论旨有关的是，袁宏将士风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分别称之为“风”和“流”，范曄更将汉末“肆直”士风的追随者径称为“希风之流”。以风、流来描述和指称特定的士人群体及其风气，似乎前此未见。范曄《后汉书》又将这种意义上的“风”和“流”合成一个双音词。卷八二上《方术传上·论》：

汉世之所谓名士者，其风流可知矣。虽弛张趣舍，时有未纯，于刻情修容，依倚道艺，以就其声价，非所能通物方，弘时务也。

这是以“风流”来形容东汉“名士”“经明行修”、刻意求名的特征和风气。^②党锢事件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。《后汉书》卷六一《左周黄列传·论》：

及孝桓之时，硕德继兴，陈蕃、杨秉处称贤宰，皇甫、张、段出号名将，王畅、李膺弥缝袞阙，朱穆、刘陶献替匡时，郭有道奖鉴人伦，陈仲弓弘道下邑。其余宏儒远智，高心絮行，激扬风流者，不可胜言。而斯道莫振，文武陵队，在朝者以正议婴戮，谢事者以党锢致灾。往车虽折，而来轸方道。所以倾而未颠，决而未溃，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？呜呼！

这里以“风流”形容党锢名士的正气、风骨及其影响。《后汉书》的编纂，与《世说新语》的编纂同时，当时魏晋名士风流的余韵犹存，范曄将“风流”与“党锢名士”联系在一起，或许是受自己心目中魏晋风流名士形象的影响。而汉末党锢名士之于魏晋名士，正如汉末作为人物批评的清议之于魏晋作为老庄玄学的清谈一样，二者并非毫无关联，毋宁说党锢名士正是魏晋名士的前辈，陈寅恪、唐长孺等

^① 《后汉纪》卷二二《桓帝纪》延熹九年条，第432—434页。

^② 有关东汉名士特征、本质及其群体属性的权威性论述，当推唐长孺先生《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》，载所著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25—52页。



先生已有精审论述。^①而“肆直”的党锢名士之蜕变为“风流”的魏晋名士，或者说魏晋放达士风的兴起，实与东汉末年结局惨烈的党锢之祸，导致“婞直之风”盛极而衰有关。这样一种转变，也导致了“风流”含义的演变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刘琰传》：

刘琰字威硕，鲁国人也。先主在豫州，辟为从事，以其宗姓，有风流，善谈论，厚亲待之，遂随从周旋，常为宾客。……（后主时）迁车骑将军。然不豫国政，但领兵千余，随丞相亮讽议而已。车服饮食，号为侈靡，侍婢数十，皆能为声乐，又悉教诵读《鲁灵光殿赋》。建兴十年，与前军师魏延不和，言语虚诞，亮责让之。琰与亮笺谢曰：“琰禀性空虚，本薄操行，加有酒荒之病，自先帝以来，纷纭之论，殆将倾覆。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，原其身中秽垢，扶持全济，致其禄位，以至今日。（下略）”于是亮遣琰还成都，官位如故。

又《三国志·杨戏传》注引东晋习凿齿《襄阳（耆旧）记》：

习禰有风流，善谈论，名亚庞统，而在马良之右。^②

刘琰和习禰之“有风流”，实为其人格、气质的抽象，其主要表现则是“善谈论”。关于东汉时期的“谈论”，据刘季高等先生的研究，有“品核公卿，裁量执政”、“非议朝政”的“清议派”和“奖训士类”、品题人物的“人伦派”等多种类型，占主流的是后者，后者又以“善谈论、美音制”的郭泰和“好人伦”、主持“月旦评”的

① 魏晋名士几乎全部出自门阀士族。唐长孺先生曾论证指出，“汉末大姓、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”，而“汉末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大姓、名士是所谓‘党人’”，尽管“不是所有汉末大姓、名士”，更不是所有党人，“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”。说见唐先生《士族的形成和升降》，载上揭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，第53—54页。陈寅恪先生谓魏晋“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，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，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，启自郭林宗，而成于阮嗣宗，皆避祸远嫌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。”“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，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……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，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，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，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。”陈氏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，氏著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80—181页。唐长孺先生亦指出汉代的清谈与清议相通而互称，都是以人物批评为主，至魏末王弼之后，清谈中心始集中于老庄玄学，遂与清议从互通变为不同的意义。说见《清谈与清议》，载所著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55年，第289—297页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四〇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1001—1002页；同书卷四五，第1085页。黄惠贤先生《校补襄阳耆旧记》，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第22页。



许邵为代表。及至汉献帝、三国时期,出现了学术性“谈论”,由主持清议、奖拔人才、讲求政军谋略而转向“玄虚”^①。刘琰和习祯的谈论内容,史无记载,今已不得而知。《襄阳记》称习祯“名亚庞统”,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庞统传》,统亦为善谈论、“性好人伦”,不过如何焯所言,这还是“东汉之风流”。^②但从刘琰“车服饮食,号为侈靡,侍婢数十,皆能为声乐”,“言语虚诞”,“身中秽垢”,“禀性空虚,本薄操行,加有酒荒之病”,知其性行颇为放达,所谈或涉“玄虚”,其“风流”已接近两晋名士,故义门何焯谓刘琰使侍婢“诵读《鲁灵光殿赋》”,乃是“于侈靡中炫其风流”。^③其当官而不任事,“随丞相亮讽议而已”,又因薄行、酒荒等,幸亏诸葛亮“扶持全济”,才得保禄位。而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,亮虽以信奉申韩法术、治理军国严明著称,若就其个人好尚而言,却与刘琰颇有相通的一面,其善“谈论”自不用说(如“隆中对”及赤壁战前说孙权抗曹),本传称其隐居隆中时“躬耕陇亩,好为梁父咏”,裴注引《魏略》则谓其“晨夜从容,常抱膝长啸”。又据东晋裴启《语林》:“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,将战,宣皇戎服莅事,使人视武侯,乘素舆,葛巾毛扇,指麾三军,皆随其进止。宣王闻而叹曰:‘可谓名士矣!’”“素舆、葛巾、毛扇”(或称“白毛扇”、“白羽扇”)的形象,隐“耕”“咏”歌,“抱膝长啸”的举止,^④不禁使我们想起其后两晋名士的风度。《语林》称司马懿叹羨诸葛亮“可谓名士”,历史上未必实有其事,却反映了晋人对诸葛亮名士风度的认同。《文选·赞》所录袁宏《三国名臣序赞》亦称诸葛亮“遐想管乐,远明风流”;“标榜风流,远明管乐”。唐六臣注释此“风流”,或引征嵇康《琴赋》中的“体制风流,莫不相袭”,或称诸葛亮“远知此二人(管、乐)高风流于前代,可师而行”,或称其“见古人之风流”而“自比”^⑤,理解不尽相同,但在名士以风流相标榜的东晋时代,袁宏以“风流”来“赞”诸葛亮,正是将他视为风流名士的。由此可见诸葛亮对“有风流”的刘琰之欣赏、扶持有加,或有惺惺相惜之故。

① 刘季高:《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特别是“引论”,第19—32,45—47页。参上揭陈寅恪先生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,唐长孺先生《清谈与清议》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三七,第953页。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卷二七《三国志·蜀志》“庞统传”条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464页。

③ 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卷二七《三国志·蜀志》“刘琰传”条,第468页。

④ 欧阳询撰、汪绍楹校:《艺文类聚》,卷六七《衣冠部·巾帽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新2版,第1187页。又见《初学记》卷二五《器物部·扇》(中华书局,2004年第2版,第606页)、《太平御览》卷三〇七《兵部·麾兵》、卷七〇二《服用部·扇》,第1414、3133页。《初学记》作“白羽扇”,《御览》一作“白毛扇”,一作“白羽扇”。

⑤ 《六臣注文选》卷四七,第900,904页。